

文化传统与当下

感悟经典

人与动物的差别在德性还是理性?

□何中华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意思是，人与动物的差别就那么一点点儿，普通人不在乎它，而有道德的人却坚守着它。那么这个微小的差别是什么呢？孟子认为，这种差别就是唯有我们人类才有良知良能，而动物则没有。的确，就饮食男女而言，人同动物了无差别；人也得渴了喝水，饿了吃饭。着眼于这些生理机能，就不可能把人同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在这方面，人没有丝毫优越于动物的地方。有道是“天地之间人为贵”，可是人究竟凭什么才高贵呢？中国的先哲认为，只有道德才是人之为人的最后的和最高的标志。

既然按照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观念，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按照其本性实现自

己，那么人也应该自适其性。而人的本性就是道德，因为只有它才能凸显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理由。所以，差别虽小，意义却十分重大。它能否在人的所作所为中被体现出来，将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能否被证立。我们常常斥责那些败德之人“禽兽不如”，“衣冠禽兽”，其实就隐含着中国文化对于“人”的这种理解。

孟子说：人若“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仅仅知道满足衣、食、住的需要，这不过是人的生物学本能罢了；若不懂得培养人的道德伦理，则人同禽兽就相去不远了。所谓“教”，在孟子看来，就是“圣人……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话当然是就传统社会而言的，我们不能苛



中国文化把有无德性作为人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而西方人大都信奉“人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区别。

求古人；但是他讲的道理却有其超越时代的意义。

人同动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别在于，动物不需要“做”动物，而人却不然，

人需要“做”人，且必须“做”人。因为动物只有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它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它的生物学本能决定的轨迹。人就不是这样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都面临着两种可能性：究竟是沉沦还是拯救？人把自己从肉体存在中提升出来，就是拯救。这就像逆水行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必须逆生物学本能而行。但是，倘若向动物式的存在沉沦则非常容易，它就像顺水推舟，一不留神就堕落了。当人屈从于肉体原则的支配时，就是沉沦，就是堕落。当人们按照道德原则行事时，就是拯救，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他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如何“做人”的问题，使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必须时刻慎乎其微。

中国文化把有无德性作为人同动物的最本质的

区别，这迥异于西方文化。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大都信奉“人是理性的动物”，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区别。它们体现了东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类型的分野，即德性与理性。其实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怎样理解自我，就会怎样塑造自己。按照中国人的自我理解，我们历史地生成了一种悠久的伦理本位主义的文化传统，强调道德的优先性。这种文化偏好养成了中华民族温柔敦厚的人格品性。西方人自古希腊开始就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理性”。这种自我观照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西方文化传统。尽管西方有其悠久的宗教历史，但是也无法摆脱理性的宰制，中世纪神学试图寻求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个背景下，科学理性主义文化成为西方的主流。科学技术在近代以

来的巨大进步，无不是这种文化传统孕育的结果。

由上述分野决定了“西方人走的是知识的道路，东方人走的是道德的道路”（熊伟先生语）。如果说中国人相信“德性就是力量”，那么西方人则更倾向于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从东西方的实际历史看，与近代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相比，中国人更有资格说“德性就是力量”。事实上，一个民族也像一个人一样，不能没有科学理性，也不能没有德性良知。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和交融，这类仅仅固守于单个方面的偏颇，倒获得了矫正和补充的机会。关键在于，在借鉴和弥补的同时，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把自己原有的优势在不经意间轻易地葬送掉。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徐勤玲

身边的传统

一冷一热的两场儒学讲座

我所在城市的图书馆，定期邀请国内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举行公益讲座。讲座的内容一般会在媒体预告，并对讲座人的背景和学术成就做简要的介绍。我经常留意这方面的信息，有感兴趣的内容就去听一听。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图书馆周末将邀请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华人教授H君来讲儒学。H教授早年师从著名儒学大师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后去美国留学、工作。我本来对儒学就很感兴趣，再一看H教授师出名门，儒学功底一定非常深厚，且有海外留学工作的背景，对儒学的研究一定会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我想这样的讲座一定会吸引众多的人，于是周末一大早就出门了，只为早一点赶到图书馆，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也许是去得太早了，报告大厅里的人稀稀落落，寥若晨星。我在前排中间的位置坐了下来。我以为过一会儿听讲座的人会继续增加。出乎我的意料，直至H教授出场开讲，偌大的报告厅也不过十几人。H教授的讲座果然很精彩。他讲述了儒学在海外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儒学当今在世界迅速传播的原因，并澄清了生活中人们对儒学的误解。可是我略感遗憾的是，这么精彩的报告竟然只有这么少的人来听。

接下来的周末，图书馆又举办了一个儒学讲座，邀请的是国内的L教授。据媒体报道，L教授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对儒学有独到的研究，出过好几本书，把儒学用于商业领域，取得很大成功，曾帮助多家企业取得不错的业绩。讲座那天，我照样去得很早。可是一进报告厅，我就吃了一惊：报告厅里坐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我好不容易才在后排的角落找个位置坐下。一抬

头，就看到前面讲台边的大屏幕上正在播放宣传资料，大体是介绍L教授把儒学用于商业所取得的辉煌业绩。每个人都拿着进入报告厅之前发给的宣传材料在看，整个会场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我忽然想起，刚才进入报告厅之前，每个人都要登记详细的个人资料，这在我以前听过的历次报告中都是没有过的。报告厅里浓重的商业味道使我怀疑，那是不是寻找潜在商机的一种手段呢？听完L教授的整个讲座，感觉与其说他在讲儒学，倒不如说是打着儒学的名义在搞商业宣传。

我常常想，前后两次儒学讲座，为什么听讲座的人数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从听讲座的个体的角度出发考虑，每个人都是带着各自的目的和需要去听讲座的。从讲座的内容来看，H教授的讲座，是纯粹的学术和知识，里面没有任何商业成分，L教授的讲座，核心在于商业，学术只是商业内核的外衣。因此从两次听讲座的人数看，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的价值取向呢？对利益的追逐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L教授的讲座与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人们趋之若鹜，而H教授的讲座不会直接给人带来任何利益，因而听者寥寥无几。

追求利益不是不好，但是一味地追逐利益，会使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从而导致人的物化，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恰恰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H教授的讲座使我欣慰之处，就在于它使我看到，毕竟社会上还有那么一些人，不为现实的利益所动，仍然坚守自己的精神高地。

“传统大家谈”有奖征集话题

“文化传统与当下”大型文化专题在本报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是您所敬仰并积极遵守的？什么样的传统是您觉得应该摒弃的？我们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展开“传统大家谈”有奖话题征集活动，欢迎广大读者提供与当下生活联系密切的文化传统话题，并积极参与每期的话题讨论。

【第一期话题】：

父母在，我们要不要远游？

【话题缘起】：前段时间，内地青年作家张一一以“制约中国旅游业发展”为由，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及其后人一起告上法庭并索赔250亿元，原因就是旅游业是世界第一产业，而由于孔子的一句

“父母在，不远游”，使得中国人2000多年来不得不宅在家里含饴弄孙，不愿意也不敢出远门，从而导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在全球相对滞缓和落后。

孔子的这句话真的是制约中国旅游业的桎梏吗？“父母在，不远游”在今天究竟还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呢？在独生子女家庭众多的今天，子女成年后，远离父母在外地甚至国外工作定居的不在少数，而奉养双亲的确是个问题。今天的你，对孔子这句话是怎么认识的呢？请登陆微博齐鲁（http://tr.qjwb.com.cn），参与“文化传统与当下”话题。我们将每期推举一名发言者为幸运读者，奖金100元。同时欢迎提供新话题进行讨论，话题一经采用，奖励最低100元，上不封顶。——编者

有此一说

颜回是现代入学习的榜样

□符号

一个缺衣少食、居无定所的乞丐，有一天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每一天也不再为吃饱饭发愁，这个人的幸福指数肯定会比他做乞丐时要高出许多。

一个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的囚徒，有一天获得了自由，到处可以走走，随时能享受到和家人的交谈，这个人的幸福指数肯定比他做囚徒时要高出许多。

机械的唯物主义者就是从这些极端的处境中推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认为一个人幸福指数的高低取决于此人所处的外部条件。并把那些通过调整自己的心灵，而调整自己的幸福指数的做法，一概贬称为阿Q主义或精神胜利法。

这其实在方法论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和基本的人身自由得不到满足时，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但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和基本的人身自由得到满足时，这时外部条件对人们幸福指数便没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心理学家科学研究所得的结果，对此提供了证据：在美国的中学中，教师们取得终身教职的职位，是他们一生职业生涯的奋斗目标。于是，有一年在评定终身教职前，心理学家对一大学中有资格参与终身教授角逐的老师做了一次调查，他们调查了老师们此时的幸福指数，并访问了如果评上终身教授对此后幸福指数的

把人生幸福的感觉寄托于外界条件的不断丰富上，结果没有用，无论你向外再怎么追求，你发现，最终还要回到你那条幸福指数的水平线上。

影响，大多数老师的回答是：“如果今年能评上终身教授，那就太幸福了，并且这种幸福感在余生都会有所体现。”等终身教授评定结束，结果自然是有的人评上了，有的人没有评上，心理学家又对这些人做了调查，评上的幸福指数明显升高，并确实认为这会让自己的余生更加幸福，没评上的幸福指数自然下降了许多。三个月后，心理学家又做了一次调查，这时评上的已没有了当时的兴奋，没评上的也没有了当时的沮丧。六个月后心理学家再做了一次同样的调查，这时所有人的幸福指数都恢复到了评定终身教授前的水平，包括那些坚信评上会让自己的余生更加幸福的人。于是，心理学家得出结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这一约束条件下，人的幸福指数是有一条恒定的水平线的，外界条件的变化只会使人的幸福感在这一水平线上下波动，但从长远来看，对人幸福指数的高低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现代人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基本的物质需求和基本的人身自由得到满足的人，但这样的现代人

没有自觉到自己幸福指数水平线的存在，他们对幸福指数提高的追求，仍持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外界物质条件的改变可以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于是把人生幸福的感觉寄托于外界条件的不断丰富上，如，更大的权力、更好的车子、更多的钱、更宽敞的房子等等，结果没有用，无论你向外再怎么追求，你发现，最终还要回到你那条幸福指数的水平线上。

以王阳明心学哲学的观点，人们要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不在于向外追求，而是应返回内心，提高自己幸福指数的那条水平线，外部条件不变，幸福指数的水平线提高了，幸福感自然会增强，而这条水平线的提高不决定于外部，只决定于内心。只有坚定了自己的内心，才会摆脱外界束缚下的幸福，获得自由的幸福，物物而不物于物。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过去理学家教人，每每会让人寻找：“孔颜乐处”，让人体会孔颜之乐，乐在何处？当年，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不是一个苦行僧，但他是一个通过学习不断把自己的幸福指数水平线往上提高的人，所以即使他外界条件比别人差一些，他的幸福感也比别人强。颜回是现代入学习的榜样，颜回不是没有他的幸福与痛苦，但一定比现代人的更高级、更自由、更少荒谬感。